

创造力研究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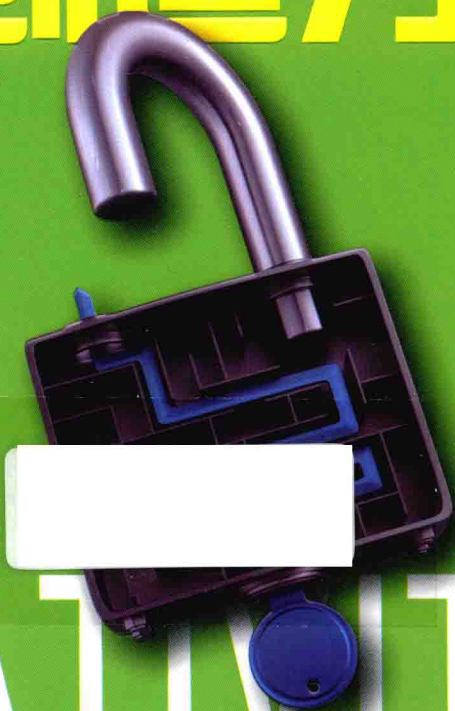
情境中的 创造力

特雷莎·阿马比尔
Teresa M. Amabile

著

刘 莘 主编

刘 艳 译
付晗晓



CREATIVITY IN CONTEXT

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有人盯着现成的事物问为什么，我则梦想着从未存在的事物问它们为何不存在。

——萧伯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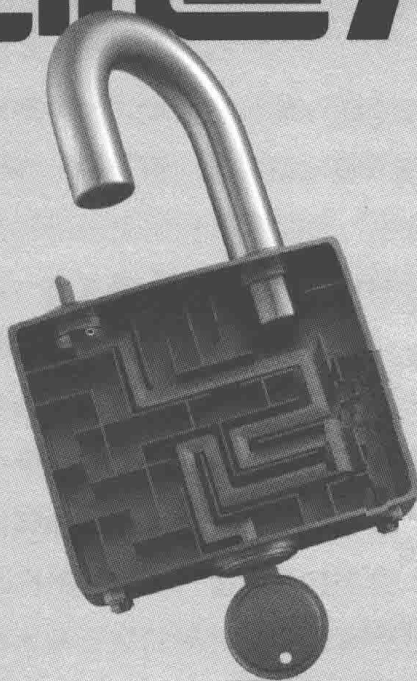
情境中的 创造力

特雷莎·阿马比尔
Teresa M. Amabile

著

刘 艳
付晗晓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境中的创造力 / (美) 阿马比尔著; 刘艳等译. —修订本.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7
(创造力研究译丛)
ISBN 978-7-220-09743-0

I. ①情… II. ①阿… ②刘… III. ①创造性思维—思维
方法—研究 IV. ①B80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7586 号

CREATIVITY IN CONTEXT

by Teresa M. Amabile

Copyright © 1996 by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PBG Publishing,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Co., Ltd. by arrangement with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PBG Publishing, LLC, 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进] 21-2012-38

QINGJINGZHONG DE CHUANGZAOLI

情境中的创造力

刘 莘 主编

特雷莎·阿马比尔 著

刘 艳 付晗晓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营销策划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韩 波
蒋宏工作室
戴雨虹
张明辉
蓝 海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240mm

25. 5

354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43-0

6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创新实现梦想

儒家经典《大学》里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自己经常使用的器皿上刻有“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大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里蕴涵强烈创新精神的最早佐证。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历经磨难却又不断壮大，在文化、思想、艺术、科学等方面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商周鼎盛、先秦争鸣、汉唐国强、宋明文兴、清末图存，发人深省的历史经验反复述说这样一个道理：创新者昌，守旧者衰。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部积弱外遭侵袭，痛苦地承受着千年未有之巨变。不甘山河破碎的先驱者们，即使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向他者学习。先驱者们凭着“以一簣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的信念和滴水石穿的精神，逐渐消化吸收诞生于异域文化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已经摆脱贫弱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在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丧失竞争优势和环境资源上的可持续性。在这个大背景下，能否把低成本人力资源和高能耗的发展模式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决定着中国梦能否最终实现。要实现经济转型并建设创新型社会，就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这就必然会对我

们的教育事业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那么，什么是创新能力或人的创造性？创新能力或创造性是可以培养的吗？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创新人才的成长呼唤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除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特别关心的人才培养问题，如何通过组织创新和领导力的提升去激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创新活力，也是建设创新型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创造力研究译丛》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都有丰富的回答，特别是对我们当今的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套译丛取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从翻译引介的意义上讲，始于19世纪的“西学东渐”并未停下脚步。随着人类一体化的不可逆转和越来越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选择性融合将成为常态。我们有理由系统了解和学习发达国家在创造力问题上推进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实践。虚心使人进步，这一条真理也适用于创造创新。国运兴衰的历史视野对我们的启发是，无论是技术技能的“用”的层面，还是在文明文化的“体”的层面，真正的创新从来都没有捷径。创新不可能离开务实的学习、积累和传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超越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当然，从体用二分的视野来看，创造创新不仅在“用”的层面上为社会所需，更是在“体”的层面上支撑着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有理由认为，人唯有在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和自由。

个人梦想的实现依赖于创造性潜能的唤醒，国家和人类梦想的实现也离不开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创新。创新实现梦想，唯有创新能够协调个体梦想与集体梦想，并把梦想的阳光、色彩和美丽照进人类的现实。

四川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谈和军

2016年1月14日

总 序

创造力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天地之间，唯有人是具有目的性和创造力的存在者。充斥着偶然性和无目的性的自然演化，居然诞生出了人这个物种。随着文明的进程，现在的人类已经能够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去改变或引导自然演化的进程和方向。不具有创造性目的的自然演化，究竟凭借着怎样的力量，才能无中生有地诞生出人及人的创造力？《旧约·创世记》中的启示是：人是由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凭借自己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人及其创造力只可能源于上帝这个至高的创造者，人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上帝的精神形象才可能具有创造力。启示的宗教强调按照神圣教义而生活，并不看重如何激发人的潜能去创造专属于人的世界。希伯来文明及后来血脉相连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创造性贡献，但人类的创造力本身却不可能成为它们关注的焦点。

与之相对照，启示宗教缺位的古希腊文明，在艺术、科学和哲学上表现出更大的创造力。荷马时代的诸神在人类理性对天地万物的自由探索中，隐退在城邦鼎盛的古典时期。希腊人对秩序、法则、美、善和智慧的追求和成就，随着近代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古典源泉。希腊人意识到并惊讶于天才人物的巨大的创造力，但

创造力本身却不属于理性探究的范畴。在希腊人看来，创造力是缪斯女神的恩赐，隐晦、神秘而难以捉摸。现代以来，创造力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祛魅创造性的神秘性，但为何古希腊文化具有如此之高的创造力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古典文明昌盛的“轴心时代”，东方的古代印度和中国文明也有极高的创造力，孕育出了迥异于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范式的文化和精神。但这些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古典文明，却都没有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人类在创造力上的自我意识，直到现代文明深入推进的 20 世纪才全面苏醒。

1950 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J. P. Guilford）以创造力为主题，发表了出任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这篇演讲给出的疑惑是，为什么创造力如此重要但对这方面的研究却如此之少？吉尔福德当然知道，早在 1869 年，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 Galton）就出版了《遗传的天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把创造才能作为一种可观察和测定的人类特征来进行研究；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于 20 世纪早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从哲学的视野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于创造力的理解；美国企业家奥斯本（A. F. Osborn）于 20 世纪 40 年代倡导“头脑风暴”，第一次把创造力促进作为交流目标引入企业组织。虽然这些事例在创造力研究和促进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直至吉尔福德发表演讲的时候，创造性人格、创造性认知、创造性环境、创造性教育等核心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套丛书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响应吉尔福德号召的成果。其中，著名心理学家韦斯伯格（R. W. Weisberg）的《如何理解创造力——艺术、科学和发明中的创新》，系统讲解了如何正确理解人类创造力，并通过对若干重要案例的剖析解读了创造性人格的构成和创造性认知风格的特征。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阿马比尔（T. M. Amabile）的《情境中的创造力》是该领域的名著，深入研究了环境对于个人和组织创造力的影响，并给出了提升组织创造性的方法。纽约州立大学国际创造力研究中心负责人普奇奥（G. J. Puccio）的《创造性领导力》是一

本致力于提升领导者创造力的优秀著作，具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丰富的案例追踪和实用的方法路径。这套译丛中有三本是与教育相关的，从不同的视野和层面探讨了如何通过教育促进创造力的发展。《绘画：开启儿童创造力》基于儿童绘画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儿童的创造力如何通过绘画作品予以激发、表现和发展。《课堂中的创造力》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致力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创造力的著作，以课堂和教学为核心，展现了不同学科在教与学的创造力促进上的内涵和意义，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提升高等教育创造力》是国际创造力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聚焦高等教育的著作，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本译丛的最后一本入选著作《创造力：当东方遇上西方》，从文化差异性的视角分析了人们在创造性观念和行动上的区别，在今天全球一体化促进人类创造力的共识下，特别是在今天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很有启发意义。

由于创造力研究涉及很多领域，许多专业术语没有固定译法，译本中难免有少许瑕疵或疏漏，请广大读者谅解。

“创造力研究译丛”编委会

2015年12月

增订版前言

Preface to the Updated Edition

当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表示有兴趣再版《创造力社会心理学》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该书最初于 1983 年出版，现已绝版三年。每当研究人员或学生问我在哪里还能买到时，我都会感到沮丧。得知该书又可以出版面世，我不仅高兴，而且也清醒地意识到很多新的发展并没有呈现在最初的版本上。增订版更名为《情景中的创造力》，我希望这个增订版既能保留最初版本的内容，又能提供创造力领域的最新发展。正如现在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个增订版将基于初版并得到扩展。 xi

自从我开始写《创造力社会心理学》一书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岁月匆匆而过，而我对创造力的研究和思考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年我和很多新学生和新同事共事过。我们继续探讨了 1983 年版中所列出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朝着新的方向继续推进。我们已经开始研究社会因素如何维持创造力，并且进展顺利，效果大大超过我们早先的研究，当时是把焦点集中在社会因素是如何扼杀创造力的。我们也研究了人格因素——稳定的个体差异——在动机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们在若干领域如何影响创造力。我们开始仔细思考动机影响创造力的认知机制。我们通过研究新人群（如职业艺术家和科学研究人员）、新环境（特别是商业组织）、新方法（例如调查、采访以及检验历史上的创作）等来扩展研究。

二十多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创造力时，我就想象着自己能够仔细、系统地为社会心理学科学的大框架增添一点内容。回想起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的工作似乎更像是一段充满惊喜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努力搜寻这个重大谜题的点点滴滴。虽然这些发现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它们却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段旅程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传统社会心理学领域，继而把我带到了这些不同的新领域——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组织发展学，这些新领域包含着这一重大谜题的相关知识。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巧妙调查，这一有过计划和混乱的旅程已经被同时打上稳定和变化的印记。尽管谜题现在已经有了解决的形态，但仍有很多空白。我很高兴能够分享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段旅程当中的新发现，这也是这次增订版所要达到的目的。

让我为增订版本提供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初版的前言、书的主体部分（一到十章）以及这十章的参考文献，都没有改动。我们觉得有必要保存这些关于社会心理学之创造力的最初陈述，因为它们主要是充当这一领域过去几年发展状况基础的角色。更新的内容是直接放在各个章节后面的。并由本人、玛丽·安·柯林斯（Mary Ann Collins）、雷吉娜·康蒂（Regina Conti）、埃莉斯·菲利普斯（Elise Phillips）、玛莎·皮卡列洛（Martha Picariello）、约翰·鲁肖（John Ruscio）、迪安·惠特尼（Dean Whitney）所写。其他同事为本书的起草提供了详细及宝贵的建议。他们是史蒂夫·克雷默（Steve Kramer）、贝丝·亨尼西（Beth Hennessey）、卡尔·希尔（Karl Hill）、希瑟·库恩（Heather Coon）、马克·伦科（Mark Runco）、斯科特·艾萨克森（Scott Isaksen）、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无论是这些同事，还是那些合著者，都不应该为那些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和我争论某一特定地方最后该如何陈述，有时我听进去了，而有时却没有（我也应该注意到，尽管新版中我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但是从1983年版中使用的“我们”确实是仅仅指我一个人，是我提出的大部分的见解，也理应为在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

在最初的十章里，我们在各个有更新的章节或段落旁的空白页面处画了一个特殊的符号^①，以便标注该部分所包含的实质性的新理论或数据。这个特殊的符号就出现在某段旁边的页面空白处。

在更新过程中，我们回顾了社会心理学自 1983 年以来创造力领域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和研究变化。尽管新版中涉及的很多理论和研究来自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也试着为同一领域的其他贡献者做一个概述。

在过去十二年中的不少研究中，我得到了很多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我深深地感谢这些机构的帮助。它们是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育研究所、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埃克森教育基金会以及里海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

我的研究工作也得益于许许多多的合作者——研究生、本科生、研究实习人员、研究助理及全体同事。我想挑出两位谈谈，他们对我过去十年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影响，同时他们富有成效的贡献更是无价的。贝丝·亨尼西在 1981 年开始与我共事，当时她还是研究生。她在新版报告的很多研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之后成为了卫斯理学院的正式员工，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她仍然继续充当着一位重要的研究助理、同事，甚至朋友的角色。卡尔·希尔是 1983 年开始与我共事的，当时他是布兰迪斯大学一名研究生。在我实验室做事的那些年，他开始将研究项目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经济、有效的模型。在卫斯理学院工作的那些年，他也继续为这项工作提供卓越的贡献，之后他成为了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我很感激卡尔在这些年对我们所做的付出，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对我个人而言。其他的合作者还有：吉姆·阿普尔曼（Jim Appelmans）、鲍勃·伯恩赛德（Bob Burnside）、米歇尔·卡斯尔（Michel Castle）、玛丽·安·柯林斯（Mary Ann Collins）、雷吉娜·康蒂（Regina Conti）、希瑟·库恩（Heather Coon）、芭芭拉·格罗斯曼（Barbara Grossman）、努尔·格里斯基维斯（Nur Gryskiewicz）、斯坦·格里斯基

xiii

① 这些符号在翻译过程中并未作保留。——译者注

维斯 (Stan Grysiewicz)、杰西卡·吉特 (Jessica Guite)、珍妮弗·哈莱姆 (Jenifer Harlem)、凯瑟琳·霍尔特 (Kathleen Holt)、南希·凯斯特 (Nancy Koester)、马西·科曼 (Marcie Korman)、汤姆·莱希 (Tom Leahy)、爱丽特·梅伦 (Ayelet Meron)、吉尔·尼米罗 (Jill Nemiro)、埃莉斯·菲利普斯 (Elise Phillips)、玛莎·皮卡列洛 (Martha Picariello)、萨拉·波拉克 (Sara Pollak)、沙里·里斯特 (Shari Rist)、约翰·鲁肖 (John Ruscio)、艾米·西尔弗曼 (Amy Silverman)、黛比·斯蒂芬斯 (Debby Stephens)、莫妮卡·苏丹 (Monica Sultan)、西尔维斯特·泰勒 (Sylvester Taylor)、桑德拉·蒂尔 (Sandra Teare)、伊丽莎白·泰伊 (Elizabeth Tighe)、迪安·惠特尼 (Dean Whitney)。我非常感激他们给予我的关爱、智力激发以及富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要感谢我在布兰迪斯大学十八年来阿马比尔研究团体 (ARG) 的成员，他们证明了进行有持续挑战的、有意义的、充满乐趣的高水平会议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新归属，哈佛大学商学院，让我结识了新的同事，他们提出的多方面挑战性问题已经对本次新版中所要表达的观点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通过这一领域许多同人的著作、谈话、会议报告，我的思维也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重塑。这些同事是弗兰克·巴伦 (Frank Barron)、迈克·奇克森特米哈伊 (Mike Csikszentmihalyi)、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斯科特·艾萨克森 (Scott Isaksan)、迈克尔·柯顿 (Micheal Kirton)、锡德·帕尼斯 (Sid Parnes)、大卫·珀金斯 (David Perkins)、马克·伦科 (Mark Runco)、多里·沙尔克罗斯 (Dorie Shallcross)、迪安·西蒙顿 (Dean Simonton)、莫·斯坦 (Moe Stein)、鲍勃·斯滕伯格 (Bob Sternberg)。而我发现某些研究会议特别具有启发性，如 1988 年匹泽学院 (Pitzer College) 创造力大会，1990 年哈佛大学研究生学院教育研究大会，1992 年国际创造力和创新网络大会，1994 年韩国会计研究院 (KAI) 研讨会，以及许多在年度创意问题解决的创造力教育基金会中所提到的研究报告。我感谢所有组织和有助于这些大会的

同人，当然也感谢背后支持这些同人的组织机构。

我还要感谢在本次修订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创造力教育基金会的鼓励。同样也感谢米歇尔·巴克斯特（Michelle Baxter）以及西景出版社全体员工所给予的支持。

最后，衷心地感谢我的父亲查尔斯·阿马比尔（Charles Amabile）和母亲卡梅拉·阿马比尔（Carmela Amabile）。他们唤醒了我这颗充满激情的好奇心。也感谢我的先生史蒂芬·克雷默（Steven Kremer）和女儿克里丝汀·德琼（Christene DeJong），他们一直鼓励我创造性地思考和生活。

我诚邀读者进入创造力这个谜题，仔细回味耐心填充空白之后的回报。

特雷莎·阿马比尔

1983 年版前言

Preface to the 1983 Edition

xv

本书所要阐述的想法酝酿了二十五年之久。当这些想法开始萌芽时，那时我还在读一年级，这些想法竟最终演变成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当时是在上每个星期五下午都会上的美术课。在课上，老师给了我们一些著名作品的复制品，叫我们用一套标准的八色“卡幼乐”牌蜡笔在笔记本上临摹出来。我是一年前离开的幼儿园，当时正接受老师的鼓励，开发我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但是，在每个星期五下午的这些活动中，除了沮丧我毫无收获。不知怎么，在我完成临摹了达·芬奇的《三博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后发现，这幅画似乎有些不对。我想知道那所谓的创造力到底跑哪去了。

我开始相信，那些为了提高我艺术性的努力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对艺术失去了兴趣和自发性。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时，我开始研究内部动机。对于我而言，这种为了自身利益去做某事的动机，正是那些受严格控制的美术课所忽略的重要内容。这种由社会心理学家定义的内部动机，对于创造力而言似乎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研究项目自此之后都会对这个概念给予相当多的关注。所以，本书所阐述的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对那些影响动机取向的社会变量因素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调查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以至于在创造

力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个词。我是在开始我的研究项目不久后才看到这个词的。在 1975 年的一篇文章里，D. K. 西蒙顿呼吁发展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Simonton, 1975a）。自此之后的相当长时间，他自身所做的工作为社会环境与创造力产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无价的信息。西蒙顿的档案研究法，与我的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会在第八章详细谈到。

除了西蒙顿和我自己，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实证研究谈到特定社会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创造力研究者反而将重点主要集中在创造力能力的个体差异或者是这些塑造杰出创造力的个体人格特质上。因为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很重要，所以有绝对的理由来发展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创造力研究方向。在实践层面上，社会变量是最能影响创造力行为的因素之一。我们不可以对天生的能力和人格特征作很多的研究。再者，尽管认知技能可以影响创造力的表现，但是这个过程一般得在相当长时间内 *xvi* 才表现出来。对比之下，影响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很容易改变，并且可以迅速得到对创造力表现影响的观察结果。

在理论层面上，对于创造过程的分析，把动机变量考虑在内是很重要的。这种方法通过描述传统社会心理学变量对认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对创造力行为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构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同样，通过介绍影响创造活动的社会因素和动机机制，也可以对创造力理论的构建作出一份贡献。

在第一章中，我们详细探讨了社会心理学创造力的案例。我回顾了几个富有创造力名人的著作，这些著作都谈到了社会因素对他们创造力的影响。在先前的实证研究中都仔细地考虑过这些论证。第二章，我回顾了当前创造力的定义以及评估创造力的方法。然后在第三章里，我展示了在我自己研究中所采纳的创造力定义及评估方法。第四章则概述了引导全书关于创造力讨论的理论框架。（第二章至第四章所涉及的研究材料的简短讨论可以在阿马比尔的著作里找到 [Amabile, 1982b, 1983]）

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内容是社会因素对创造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尽管五、六、七章中大多是我的研究，但是我也同样详细地回顾了其他研究

人员关于评价、奖励、选择、社会促进、榜样、动机取向等其他可能影响创造力的社会变量的工作。第九章，我从所回顾的研究中归纳出对实际操作的启示。第十章，我概述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书并没有详尽地回顾以前所有的研究。而是仅关注了人格、试验、认知和创造力训练这些与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视角最相关的内容。这些早先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当前我所尝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共同构建了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这一复杂学科的基础。本书很明显不是对创造力的完整陈述。而是关于当前学科状况的描述和一个可能存在的复杂模型的概括。

本书的研究得到下列奖学金的支持：儿童发展基金会“年轻学者”奖学金，国家健康研究所多项生物医学奖学金，以及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准博士奖学金。来自布兰迪斯大学马泽家族基金（Mazer Family Fund）的奖学金为手稿的准备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衷心感谢以上所有机构给予的支持。

有几个机构慷慨地允许我和我的学生在他们机构内进行一次或多次的研究。他们是：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的圣裘德学校（St. Jude School）、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Somerville）的圣克莱门茨学校（St. Clement's School）、马萨诸塞州爱慕斯伯里（Amesbury）的卡什曼
xvii 学校（Charles E. Cashman School）、布兰迪斯大学伦贝格（Lemberg）日托中心、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Brockton）的退伍军人管理医院。

在完善这些想法的过程中，在报告研究执行过程中，在将手稿变成最终书稿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得感谢我最初的老师，他们让我思考我的创造力潜能到底跑哪去了。我感谢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马克·莱珀（Mark Lepper）和李·罗斯（Lee Ross），多亏了他们才有了我对于创造力假设的早期形成。正是马克的研究和关于内部动机的理论探讨，才让我思考动机状态对创造力表现的影响。马克和李都支持和鼓励我在创造力研究这一领域冒险前行，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同我讨论关于我对创造力最初的想法。博士学位论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达里尔·贝姆（Daryl Be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同样也在我工作的最初阶段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我的许多同事、学生还有朋友，都对这项研究有所贡献。史蒂芬·伯格拉斯 (Steven Berglas)、埃伦·兰格 (Ellen Langer)，还有我，共同完成了本书所报告的研究内容，还有我的研究生玛格丽特·斯塔布斯 (Margaret Stubbs)、贝丝·亨尼西 (Beth Hennessey)、莫琳·惠伦 (Maureen Whalen)，我的本科学生菲莉丝·戈德法布 (Phyllis Goldfarb)、谢林·布拉克菲尔德 (Shereen Brackfield)、丽萨·伯曼 (Lisa Berman)、唐娜·卡波托斯托 (Donna Capotosto) 及南希·戈德堡 (Nancy Goldberg)。安妮·桑多瓦尔 (Anne Sandoval) 完成了我们研究中的大部分数据分析工作，这真是了不起。一些研究助理帮助我们施行研究，分析数据或者找到本书所引用的材料来源，这些人是：巴里·奥斯克恩 (Barry Auskern)、琳达·布莱泽 (Linda Blazer)、托尼·卡德纳 (Tony Cadena)、斯科特·卡林 (Scott Carlin)、罗尼·戈德勒斯特 (Ronit Goldlust)、芭芭拉·格罗斯曼 (Barbara Grossman)、玛丽·汉德尔 (Mary Handel)、利娅·考夫曼 (Leah Kaufman)、向井千寻 (Chihiro Mukai)、克里斯托弗·帕索斯 (Christopher Patsos)、盖尔·鲁宾 (Gail Rubin)、朱利亚·斯坦梅茨 (Julia Steinmetz)。还有，我的妹妹卡罗琳·阿马比尔 (Carolyn Amabile) 和菲莉丝·阿马比尔 (Phyllis Amabile)，为本书的其中一个研究的计划与实施给予了重要的帮助。

其他人则以另外的方式为本书的准备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布兰迪斯大学的“创造力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们，激发了我关于创造力更广阔的思考。来自美国雪佛龙公司的泰瑞·布坎南 (Teri Buchanan) 非常慷慨地给我们提供了雪佛龙 1981 年国家创新展览的完整资料。布兰迪斯心理事务所的弗娜·丽甘 (Verna Regan)、朱迪·伍德曼 (Judy Woodman) 还有卡伦·迪尔 (Karen Diehl)，为手稿的准备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来自电脑城的比尔·哈林顿 (Bill Harrington) 使我的苹果 II-Plus 电脑更流畅地处理文本。

尽管本书的任何瑕疵都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确实多亏几位同事的帮助使我的观点和表述更加清晰。组稿编辑罗伯特·基德 (Robert Kidd) 不